

—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前沿丛书 —

要素集聚、产业结构 与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研究： 基于专业化、多样化视角

Factor Agglomer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Based on View of Speci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王 英◎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前沿丛书 —

要素集聚、产业结构 与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研究： 基于专业化、多样化视角

Factor Agglomer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Based on View of Speci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王 英◎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要素集聚、产业结构与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研究:基于专业化、多样化视角 / 王英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9.5

ISBN 978-7-5136-4789-2

I. ①要… II. ①王… III. ①民族地区—城市经济—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29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8210 号

责任编辑 王 帅

责任印制 巢新强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富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

定 价 58.00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第 8179 号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833060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68355416 010-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12390) 服务热线:010-88386794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前沿丛书

编委会

主编：

郑长德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艳 田钊平 吴敏娜 单德朋
钟海燕 涂裕春 廖桂蓉

总 序

1949年以来，民族地区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世所瞩目的发展成绩，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

从发展的外部环境看，中国是位于亚洲大陆东部的陆海国家，邻国众多，包括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强国，一些国家之间历史与现实矛盾交织，近年来出现诸多领土、海洋权益争端。民族八省区主要位于边疆地区，既有漫长的陆路边境线，又有海上口岸。例如新疆就与8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长达5600公里，地缘政治复杂。同时中国位于欧盟、北约及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等国际政治军事组织的中间区域，欧盟东扩、东欧向北约靠拢、国际上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美俄欧盟对中国的态度及对华政策等都对中国国家安全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对我国东海南海的压力加大，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渗透加深，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地缘政治因素影响。此外，近年来，在国际恐怖活动呈反弹之势的大背景下，中国境内的恐怖势力活动升级，一些民族分裂势力企图通过制造暴力恐怖活动破坏民族团结，可能影响“十三五”时期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

从发展的国内民族关系来看，65年来的总体和谐局面在新阶段也出现了不和谐因素，“3·14事件”“7·5事件”以及近年来连续出现的暴恐事

件表明，三股势力对我西部边疆的图谋已经从舆论宣传转变为实际行动。为避免东西两面掣肘，海防与塞防关系这一历史课题再次浮现。尽管与晚清同光年间相比，我国国情和当今世情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如何确保塞防稳定以发力于海防，却具有共同性。

各民族的发展也表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正如王正伟同志所概括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工作的大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形象一点说，民族工作‘进城’了，工作重点从边疆和农村牧区延伸到城市和东部；民族工作‘下海’了，体制环境从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民族工作‘入世’了，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密切交织在一起；民族工作‘上网’了，网络世界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此外，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速，少数民族人口结构的这些变化必然带来民族经济方面的新特征。

(1) 2010 年人口普查表明，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为 32.84%，比 2000 年 23.36% 提高了 9.48 个百分点，其中有 12 个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超过 50%（表 0-1）。而且，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进程正处于加速阶段。

(2) 2010 年少数民族在业人口中第一产业占比为 69.42%，第二产业占比 12.15%，第三产业占比 18.43%。虽然总体上第一产业比重还很高，但非农就业与 2000 年的 21.15% 比较，2010 年提高到 30.58%，提高了近 10 个百分点（表 0-2）。

(3) 2014 年 7 月 21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第 3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4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6.32 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 5.27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46.9%。若按人口比例计算，少数民族网民规模在 5000 万人左右^①。

(4) 中国各少数民族人口随全国人口一起进入持续老龄化的状态，且表现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增长快、75 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增速快、老年人口规模大、老年负担系数大、老龄化族际差异大的“两快三大”的

^① 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特征。各少数民族进入老龄化社会比预期早,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呈现出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表0-3)。

(5) 少数民族人口的国际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

表0-1 中国各民族人口城镇化的变化(1990—2010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全国	汉族	少数民族	全国	汉族	少数民族	全国	汉族	少数民族
城市(%)	18.68	19.47	9.70	23.55	24.64	11.81	30.29	31.62	15.84
镇(%)	7.51	7.59	6.65	13.37	13.54	11.55	19.98	20.25	17
乡村(%)	73.80	72.94	83.64	63.08	61.83	76.64	49.73	48.13	67.16
城镇化率(%)	26.2	27.06	16.36	36.92	38.17	23.36	50.27	52.87	32.8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得到。

表0-2 中国人口产业结构的变化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全国(%)	72.24	15.3	12.46	64.38	16.81	18.81	48.36	24.15	27.49
汉族(%)	71.34	15.99	12.67	62.99	17.70	19.31	46.42	25.26	28.32
少数民族(%)	83.36	6.83	9.81	78.85	7.57	13.58	69.42	12.15	18.43

表0-3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

	总人口			汉族人口			少数民族人口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0~14岁	27.69	22.9	16.61	27.13	22.46	16.07	34.03	27.66	22.43
15~64岁	66.74	70	74.47	67.2	70.3	74.83	61.54	66.77	70.58
65岁以上	5.57	7.1	8.92	5.67	7.25	9.1	4.44	5.58	6.99
老化指数	20.12	31.00	53.70	20.90	32.28	56.63	13.05	20.17	31.16
年龄中位数	25.26	30.77	34.93	25.54	31.08	36.36	21.92	26.94	30.8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从全国经济发展态势看,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长,创造了世界瞩目的增长奇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逐步从高速增长长期转入中速增长长期,进入增长新常态。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各族人民的努力下,民族地区“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速超过全国,但在“十三五”时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经济下行压力。根据刘世锦等(2011)对世界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研究,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2015年前后很有可能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增速下降的幅度大约为30%,如由10%降低到7%左右^①。他们还还对每个省级行政区下台阶时间进行了测算,对民族八省区的测算结果见表0-4。可以看出,大多数民族省区将在2015年前后进入增长减速期,出现增长新常态,这种增长率变动趋势为民族地区的后发赶超和转型带来严峻挑战。民族地区要维持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必须主动转型,着力推进改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②。

表0-4 民族八省区增长下台阶的时间窗口

	下台阶时间							
	内蒙古	广西	贵州	云南	西藏	青海	宁夏	新疆
	2013年	2019年	2020*年	2015年	2015年	2012年	2018年	2017年
人均GDP(1990年国际元)	14646	10279	5469	5884	6092	6281	10440	10638
1978—2008年平均增长率(%)	8.61	11.10	8.43	8.07	8.34	8.43	7.00	7.67
减速后的增长率(%)	6.03	7.77	5.90	5.65	5.84	5.90	4.90	5.37
综合评价	0.61	0.48	0.44	0.44	0.26	0.46	0.54	0.53

注:①下台阶年份为 t ,表示从 $t+1$ 年开始经济增速明显下降。②*表示到2020年之前经济增速仍然按照过去30年的平均水平增长。③综合评价指标值是基于人均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分工的专业化程度、资源禀赋以及外向型程度等因素计算得到。上海的综合评价指标值为1。④1978—2008年平均增长率和减速后的增长率为笔者计算。其中,减速后的增长率按1978—2008年30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幅度为30%计算。

① 刘世锦,等. 陷阱还是高墙? 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9.

② 郑长德,罗布江村.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283-290.

二

新实践呼唤新理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和民族工作新任务，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主要有：

第一，文化多样性与规模报酬递增。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会议着重从中华民族和各民族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多民族不仅意味着文化的多样性，也意味着偏好的多样性和需求的多样性。而经济理论研究表明，正是这种偏好和文化的多样性带来了规模报酬递增，而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动力之一^①，就是“规模报酬递增”。关于文化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民族经济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第二，经济一体化与“多元一体”。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四个认同”，即“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把国家统一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从区域经济视角看，“四个认同”的基础是实现经济一体化。过去几十年，我们特别注重区际一体化，通过大规模的交通骨干通道（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建设，全国各省、区、市间的经济联系得到加强，区际一体化程度迅速提高；但区内各县、县域内通乡、通村组的道路建设滞后，区域内部的一体化程度提高程度甚微，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区域内部的破碎化。为此，此次会议提出：“民族地区交通建设，既要打通对内对外联系的‘大通道’，也要畅通与‘大通道’联系的‘静脉’‘毛细血管’。”如何把大通道的活力与民族地区旗县、乡镇、村寨嘎查（内蒙古行政村）和农户、牧户精准对接，为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提供切实的带动作用，加强对区内一体化与区际一体化的关系，经济一体化与文化一体化、

^①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驱动现代经济持续发展的三大动力机制是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规模报酬递增。

政治一体化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加强对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经济关系的研究，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是今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的重要问题。

第三，增长新常态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在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后进入了新阶段，称“增长新常态”。此时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制度的变革、技术的创新。民族地区长期依靠要素（主要是资源和物质资本）高投入驱动实现的经济的发展，不仅增长方式粗放，而且包容性程度低，对环境的影响大。在全国进入增速下降的“新常态”下，民族地区必须要加大发展方式的转变力度，提高发展质量和发展的包容性，需要深入研究的是在“增长新常态”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持续性、发展的包容性等问题。

第四，差别化区域政策。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在土地使用、金融服务、资本市场建设等方面给予差别化支持”，要“对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生态保护区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发展差异和差距大，但长期以来，中央根据全国平均水平制定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区域规划方面的政策，制定时基本一刀切，执行时更是一刀切，不考虑偏离全国平均水平地区的具体情况，既降低了政策的效率，同时也阻碍了地区的发展。因此，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不仅必要，而且符合实际。但是对民族地区实施差别化的区域政策，不是区域发展政策的“矮化”“低端化”和“施舍”，而是要真正能够推进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如何制定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如何有效实施这些政策，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例如，在中国和世界各国实施的促进地区跨越式发展成效显著的特区政策、自由贸易区政策等，可否在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实施？

第五，“三个积极性”的内在联系与体制机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必须发挥中央、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三个积极性。长期以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框架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注重发挥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两个积极性，特别关注如何加强中央对民族地区发展的转移

支付、投资力度、项目建设和金融政策扶持等方面,关注发挥民族自治地方积极性方面。在对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协调各发达地区省份的支援、协调中央和发达地区支援的关系,统筹外部支援与民族地区内生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虽有一些研究成果,但不仅理论研究有待深入,而且实证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在理论研究层面上,如发挥三个积极性内在联系的体制和机制问题,对口支援与合作共赢发展问题,等等。目前国家实施的对口支援确实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如何更好地发挥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的效应、“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体制机制”、提高自我发展能力、释放发展潜力等均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第六,资源开发与惠及当地问题。民族地区是我国重要(战略)资源的富集地,不仅石油、天然气、煤炭、有色金属等重要矿产资源丰裕,而且草原、森林、湿地、河流等重要生态资源及太阳能、生物能和风能等新型能源资源更是储量大、开发条件优越。长期以来,由于对自然资源的经济金融属性认识不足^①,加之在资源产权体制的问题上,片面强调全国一盘棋,忽视了资源开发对所在地的惠及,结果出现西气东输、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却用不到天然气,煤电并入全国电网、当地牧民却只能依靠风光互补的现象,资源所在地居民无法分享资源开发的红利。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民族地区发挥资源优势的重点是惠及当地,由此也带来了央企与当地关系以及资源开发如何惠及广大农牧户的新课题。

第七,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的关系问题。民族地区“群众困难多,困难群众多”,打好扶贫攻坚战,民族地区是主战场。“搞好扶贫开发,重点抓好特困地区和特困群体脱贫”,“要创新思路和机制,把整体推进与精准到户结合起来,加快推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提高扶贫效能”。虽然精准扶贫已提出一段时间了,也写进了相关的扶贫规划,但在实践中,对于什么是精准扶贫以及如何处理好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尚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

^① 据郑长德(2014)的研究,从经济金融角度看,自然资源具有以下属性:生态上的整体性;产权综合体;经济—生态及私人—公共属性的复合型资产;短期缺乏弹性,长期有弹性;短期缺乏弹性,长期有弹性—内生的价格波动;产地—加工地—消费地分离还是合一。

第八，民族地区城镇化问题。相较于全国和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工业化滞后。不过从发展阶段看，民族地区进入了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阶段。要加强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民族地区推进城镇化，要与我国经济支撑带、重要交通干线规划建设紧密结合，与推进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规划建设一批具有民族风情的特色村镇”。在民族地区城镇化过程中，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如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城镇化的路径选择、城乡发展一体化等。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出发，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着力构建我国国土空间的“三大战略格局”。其中的城市化战略格局是：

构建以“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构建以陆桥通道^①、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国家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的城市化地区为主要支撑，以轴线上其他城市化地区为重要组成的城市化战略格局。推进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优化开发，形成3个特大城市群；推进哈长、江淮、海峡西岸、中原、长江中游、北部湾、成渝、关中—天水等地区的重点开发，形成若干新的大城市群和区域性的城市群。

其中涉及民族地区的经济支撑带和重要交通干线建设有：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昆通道、北部湾等。确立的民族地区的城市群有：呼包鄂榆地区、北部湾地区、黔中地区、滇中地区、藏中南地区、兰州—西宁地区、宁夏沿黄地区、天山北坡地区，这些都是民族地区推进城镇化的重点地区。同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中小城市”，要“把加快发展中小城市作为优化城镇规模结构的主攻方向，加强产业和公共服务资源布局引导，提升质量，增加数量”，“培育壮大陆路边境口岸城镇，完善边境贸易、金融服务、交通枢纽等功能，建设国际贸易物流节点和加工基地”，并拟定了重点建设的陆路边境口岸城镇：

^① 陆桥通道为东起连云港、西至阿拉山口的运输大通道，是亚欧大陆桥的组成部分。

面向东北亚：丹东、集安、临江、长白、和龙、图们、珲春、黑河、绥芬河、抚远、同江、东宁、满洲里、二连浩特、甘其毛都、策克；

面向中亚西亚：喀什、霍尔果斯、伊宁、博乐、阿拉山口、塔城；

面向东南亚：东兴、凭祥、宁明、龙州、大新、靖西、那坡、瑞丽、磨憨、畹町、河口；

面向南亚：樟木、吉隆、亚东、普兰、日屋。

第九，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问题。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都需要加大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要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特色优势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上水平，加快发展服务业。”民族地区的产业大多是资源型产业，即使是特色优势产业，也主要建基于民族地区的自然禀赋特点，而资源型产业的发展面临陷入“资源诅咒”的可能，因此，如何实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业结构升级），既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第十，城市民族经济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各民族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少数民族的城镇化有本地城镇化，也有跨区域的城镇化。少数民族的跨区域大流动和城镇化提出了城市民族经济新课题。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既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又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关键是要抓住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把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注重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让城市更好地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地融入城市。这些论述不仅抓住了城市民族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指明了处理城市民族经济关系的原则和方向。

第十一，民族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民族文化研究的重点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经济发展是民族文化繁荣的基础，民族文化繁荣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和方向保证。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繁荣民族文化上，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提出了两个极为重要的命题：一是“国家统一是各民族的最高利益”，二是“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会议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

的做法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抓好爱国主义教育这一课，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在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祖国下一代的心田生根发芽。在如何弘扬和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方面，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都需要在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上才能实现。

第十二，民族地区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最终还是要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民族地区与全国一样，都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搞好和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通过市场机制与沿海地区连接，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考虑到民族地区具体的发展阶段，既面临着发达市场经济都有的市场失灵，还面临着市场不完善、市场缺失，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民族地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比发达地区复杂，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第十三，包容性绿色发展视域下的绩效考核问题。民族地区集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于一身，这既凸显民族工作在全局中的地位作用，也显示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复杂性。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民族地区要发展，而且要跨越式发展，在发展方式上要“紧扣民生抓发展”，“把生态保护放在重要位置”，即要求实现“包容性绿色发展”，这对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曾提出要用地区国民收入标准逐渐取代地区生产总值标准，今后如能利用生态GDP进行考核，把地方生态环境的改进折算成GDP，进一步把民生改善也折算成GDP，将对民族地区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三赢”，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

第十四，发展援助政策的指派问题。支持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央的一项基本方针。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发展援助，促进民族地区发展。这些援助政策，既有短期的政策，又有长期政策，不同的政策着力点不同。

在支持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如何进行有效的政策指派、提高援助的效率，是一个被长期忽略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

第十五，“一带一路”与民族地区的开发开放问题。目前正在规划建设的由沿海向内陆、向民族地区延伸的几个经济支撑带，包括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联系的西南中南经济支撑带、以亚欧大陆桥为依托的涉及西北东北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的长江经济带（“两带一路”），给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带来新的重大历史机遇。这些经济带的建设，对民族地区的开发开放、经济活动的集聚、发展的包容性等的影响，需要认真研究。

总之，民族地区发展的新阶段、民族工作的新形势，给民族工作者包括从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的学者，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何把握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提炼和探索新课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族经济研究者的主要任务。

三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科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充分体现学校“为少数民族服务，为民族地区服务，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办学宗旨和“一体两翼”的发展战略，把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作为核心研究领域，以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普通的发展理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区情结合起来，从综合、宏观的角度和战略的高度，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矛盾和热点展开研究。近年来，我们更加强调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先后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软科学项目20余项，教育部、国家民委、四川省等省部级科研项目60余项，各级地方政府横向项目60多项。“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前沿丛书”是在“中国民族地区发展丛书”的基础上，以我主持的四川省教育厅创新团队项目“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4TD0048）和西南民族大学应用经济学和中国

少数民族经济学位点建设项目为依托，瞄准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前沿问题，组织西南民族大学的相关专家学者编写的，丛书反映了西南民族大学应用经济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套丛书得到了中国经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李煜萍编审为丛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很大努力。同时创新团队项目的展开得到了四川省教育厅、西南民族大学校领导、科技处、研究生部的大力支持，以及国内外学界同仁的鼎力支持，在此我代表丛书编辑委员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郑长德

2014年12月